



【文化杂谈】

家记

□肖复兴

我五岁那年,生母去世。对于她,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前些年,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——上小学的时候,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《二十四只眼睛》,印象很深,记得很清楚,是在大栅栏里的同乐电影院看的,便同时记住了她的名字——知道了她也是五岁那年生母去世。在这本自传里,她甚至还清晰记得,当初离家跟着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,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。同样是五岁,她的记忆为什么那么好,记得那么多的事情,而且记得如此须眉毕现?

这让我非常惭愧。老来之后,常会想母亲的样子,很想也能像高峰秀子一样,搜寻出胶木奶嘴一样的细节来。但是,没有,什么也没有,母亲的样子,总是模糊的。很多时候,母亲的样子,是和姐姐模样重叠。其实,更多的是对姐姐的思念感情。因为姐姐就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,离开北京,只身去了内蒙古参加京包线的铁路建设,为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。那一年,姐姐才17岁。

1989年夏天,继母去世。那一年,我42岁。生母去世之后不久,她便来到我的身边,和我相依为命生活了三十七年。特别是父亲去世后,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,和她一起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,艰辛与共,相濡以沫,对她的了解和感情,比生母要多。1989年底,我写了一篇《母亲》,写的就是继母。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,发表在次年上海出版的《文汇月刊》第一期。1992年,被孙道临先生出任导演搬上电影银幕,郑振瑶演我的这位继母。

1994年,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《情思小语》,书中收录了《母亲》一文。我将书寄给孙犁先生。没有想到,孙犁先生读完之后,给我写来一封鼓励有加的信:

复兴同志:

您的信来得快一些,我发信,是托人代投,有时耽误。

您的书,我逐字逐句读完第一辑,其他选读了几篇。在这本书中,无疑是《母亲》和《姐姐》写得最好。文章写得好,就能感动人;能感动人,也就是有真实的感受,就是有真实的体验。这本是浅显的道理,但能遵循的人,却不多,所以文学总是无有起色。

关于继母,我只听说过‘后娘不好当’这句老话,以及‘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’这句不全面的话。您的生母逝世后,您父亲就‘回了一趟老家’。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。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,物色,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、年岁又大的女人,这都是为了你们。如

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,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。所以,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。

这篇文章,我一口气读完,并不断和我身边的人讲,他们有的看过电影。当年《文汇月刊》我是有的,但因很少看创作,忽略了。又不看电影。

现在有的作家,感受不多,感想并不少,都是空话,虚假的情节,虚假的感情,所以,我很少看作品了。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,得读这样一篇好文章,并希望坚持写真实,不断产生能感人的文章。即祝暑安!

孙犁 七月四日上午

孙犁先生的这封信,对我很重要。因为1992年我写了一篇《姐姐》。母亲和姐姐都写过了,唯独没有写父亲。我很想写写父亲,却无从下笔。相比较母亲和姐姐而言,对于父亲,我是不大了解的。

孙犁先生在信中所说:“您的生母逝世后,您父亲就‘回了一趟老家’。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……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。”看到信的当时,只是感动,并未真正理解,更未深思,尤其是对于父亲“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”,没有认识到孙犁先生话中的含义。对于世事的认知,对于世人的理解,哪怕是你觉得很亲近的家人,也囿于年龄而只是涉水未深,却自以为五湖阅尽。那时,我45岁,已经人到中年。

事过经年之后,特别是人老之后,孙犁先生所说的父亲“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”这句话,再次盘桓在心中之际,写写父亲的念头也再次涌出。重新钩沉从小到大和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,我发现,很多记忆,一直是处于沉睡状态的。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《历史的观念》一书中说:“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被连接,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,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。”

除需要唤醒这些沉睡多年的回忆,还需要打捞不少已经失去的记忆。那些记忆,之所以失去,原因是多方面的,其中重要的还在于自己,自己对世事与人心、人性的认知。不仅仅在于记忆力的好坏,更在于思想和情感,很多失去的记忆,是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筛子有意或无意地漏掉或回避的。柯林伍德说的“过去的思想”的能力,就是对那种浅薄甚至错误思想的认知与清理的能力。因此,打捞失去的记忆,同唤醒沉睡的记忆,都是一种能力。

只有这种被重新唤醒和打捞的回忆,对于今天才具有价值与意义(太滑溜顺畅的回忆,只是温柔的抚摸,意义不大),也才能够将现在

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连接起来。这个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过程,需要自己能够勇敢去面对:面对父亲,面对时代,更面对自己的内心,特别是面对自己曾经的浅薄、懦弱、伤害、过失……这一切所缠裹形成的思想与情感。对于晚年的我,是痛苦的,也是有益的、值得做的事情。

当日子和我一起变老的时候,才让我和父亲有了一点点的接近,却是付出了几乎一辈子的代价,而父亲早已远逝多年。我才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亲人之间,离得最近,却也有可能离得最远。

2015年夏天,我终于写出了《父亲》。这一年秋天,带着这个长达三万余字的初稿,我去美国看孩子,在清静的布卢明顿小城,2016年的春节期间,我将《父亲》修改完,发表在2017年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。

至此,《姐姐》《母亲》《父亲》,都写完了。无论人生,还是文学,对于我,敝帚自珍,以为是三篇重要的作品。从1989年到2016年,经过了27年,终于写完了,心里舒了一口气。这一年,正是我七十初度。

记得那年正月初七,最后改完《父亲》,关上手提电脑,走出房门,屋外大雪纷飞,漫天皆白,眼前一片迷蒙,恍惚中,不知此地何地,今夕何夕。

感谢中华书局的美意,除《姐姐》《母亲》《父亲》这三篇,意欲将这些年我写的关于家的零散文字集成一书。算一算,从最早写《母亲》的1989年,到最后一篇写孙子的《游泳记》的2023年,居然后经过了三十四年。一本小书,一个作者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,是和日子一起长大,完成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。对于我,这是绝无仅有的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本书。

过去常说家国情怀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,家和国是不可分开的。家的微观史,是国和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一滴水,哪怕只是浅近甚至浑浊的一滴水,也可以辉映着蓝天白云和太阳的光辉。这本小书,便是这样的一滴水,这里不仅仅有几代人的亲情,更有这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,才会让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家充满人生况味和世事沧桑,看到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迁。所有的苦辣酸甜、聚散离合、跌宕起伏、生老病死,在我家这样,在你家也是如此,大同小异。相信读者朋友会在这本小书中,和我的家人邂逅,也会和你的家人、和你自己相逢。

便将这本小书取名为《家记》。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名字,如同我们简单朴素的家一样。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记,即使你没有写出,也记在你的心里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□于永军

大地春回,万物复苏。济南大明湖畔问柳,寻春之消息,觅春之倩影,不由想起现代诗人郭沫若那句带有地标性的诗句“大明湖畔柳丝长”。此句出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书赠山东吕剧团的一首诗:“东风送暖百花香,开到芙蓉韵满塘。一片清芬无限意,大明湖畔柳丝长。”句中的“长”字,作为形容词形容距离时读“cháng”,作为动词读“zhǎng”,我更喜欢将之作为动词,借以说柳的萌动、春的苏醒。

柳乃春的信使,诗家词人说春,常用柳条或柳丝的意象。除了贺知章著名的《咏柳》诗之外,杜甫的《腊日》,用“侵陵雪色还萱草,漏泄春光有柳条”,描述早春的风光:别看萱草还在遭受霜雪的袭扰,柳条却已泄露出了春的消息。袁去华的《安公子·弱柳丝千缕》写道:“弱柳丝千缕,嫩黄匀遍鸦啼处。寒入罗衣春尚浅,过一番风雨。问燕子来时,绿水桥边路。曾画楼、见个人人否。”以柳丝为春景,从新柳嫩黄引来万物复苏的消息中萌发想家的情思,情不自禁地询问刚飞回的燕子:在路过的绿水桥边,有一画楼耸立,可曾看到一位美人正在屋里?可谓思绪绵绵。尤显诗人丰富想象力的当推李商隐的《赠柳》:“章台从掩映,郢路更参差。见说风流极,来当婀娜时。桥回行欲断,堤远意相随。忍放花如雪,青楼扑酒旗。”诗中虽不着一个“柳”字,却句句写柳。

诗寓画,画藏诗。在画上题柳诗说春,常常透着画龙点睛、诗画互融的艺术张力。如清代著名画家石涛在《黄山游踪》画作上题道:“明明垂柳下,春水满山田。农夫寒带雨,耕破一溪烟。”题画诗与画面浑然一体、相辅相成,大大丰富了画的意境。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鱣在《桃花春柳图》画上题诗:“数枝可作先生传,凭觞曾迷汉魏来。”虽只有两句,却与画作相辉映:柳是豪逸斜出的疏柳,临风飘拂,袅袅婷婷;桃树是屈曲盘旋的虬枝,修炼得刀枪不入,却暗藏侠骨柔情。这桃红柳绿定是写在春天。漫画家丰子恺尤喜以柳诗抒情,一幅《月上柳梢头》,把欧阳修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诗意体现得淋漓尽致:画面上,柳枝伸出院外,微风拂柳,柳丝垂垂而长,一个女子隔墙倚于下,惆怅忧伤。夜黑、月幽、柳凉,诗意增添画意,画意映衬诗意,画已非画,而是留在心间的万般愁思。

诗人所处的境遇各异,借柳丝抒发的情感也不同。如雍裕之的《江边柳》:“袅袅古堤边,青青一树烟。若为丝不断,留取系郎船。”以柳寄情,希望柳丝绵绵不断,以便把郎君的船儿系住,表现出淡淡的伤怀。杜牧的《柳长句》:“日落水流西复东,春光不尽柳何穷。巫娥庙里低含雨,宋玉宅前斜带风。不嫌榆荚共争翠,深与桃花相映红。灞上汉南千万树,几人游宦别离中!”则描绘了古人折柳相送的惜别场景,既依依相惜、愁肠百结,又缠绵动情、寓意深远。白居易的《杨柳枝词》:“一树春风千万枝,嫩于金色软于丝。永丰西角荒园里,尽日无人属阿谁?”借柳树流露出内心的不平与惋惜,表达了对当时政治腐败、人才埋没的感慨。有意思的是,白居易的另一首《杨柳枝词》则写道:“叶含浓露如啼眼,枝袅轻风似舞腰。小树不禁攀折苦,乞君留取两三条。”借柳树“含露啼眼”的诉苦与柳枝袅娜轻舞的“示怜”,发出对送别折柳之习俗的批评,显现了诗人超前的环保意识。

诗言志,言为心声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,曾在齐州担任过两年多知州,积极推行新法,使济南出现了一派“仓廩实,里閭安”的和谐景象,为此他以《咏柳》抒怀:“乱条犹未变初黄,倚得东风势便狂。解把飞花蒙日月,不知天地有清霜。”诗人将柳树写得意气风发,一副春风得意、乘势而上的精气神。在这里,杨柳不再是“柔弱”“伤感”“相思”等离愁别恨的代名词,而是充满希望、活力四射的象征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、中国作协会员)

【读史札记】

大明湖畔柳丝长